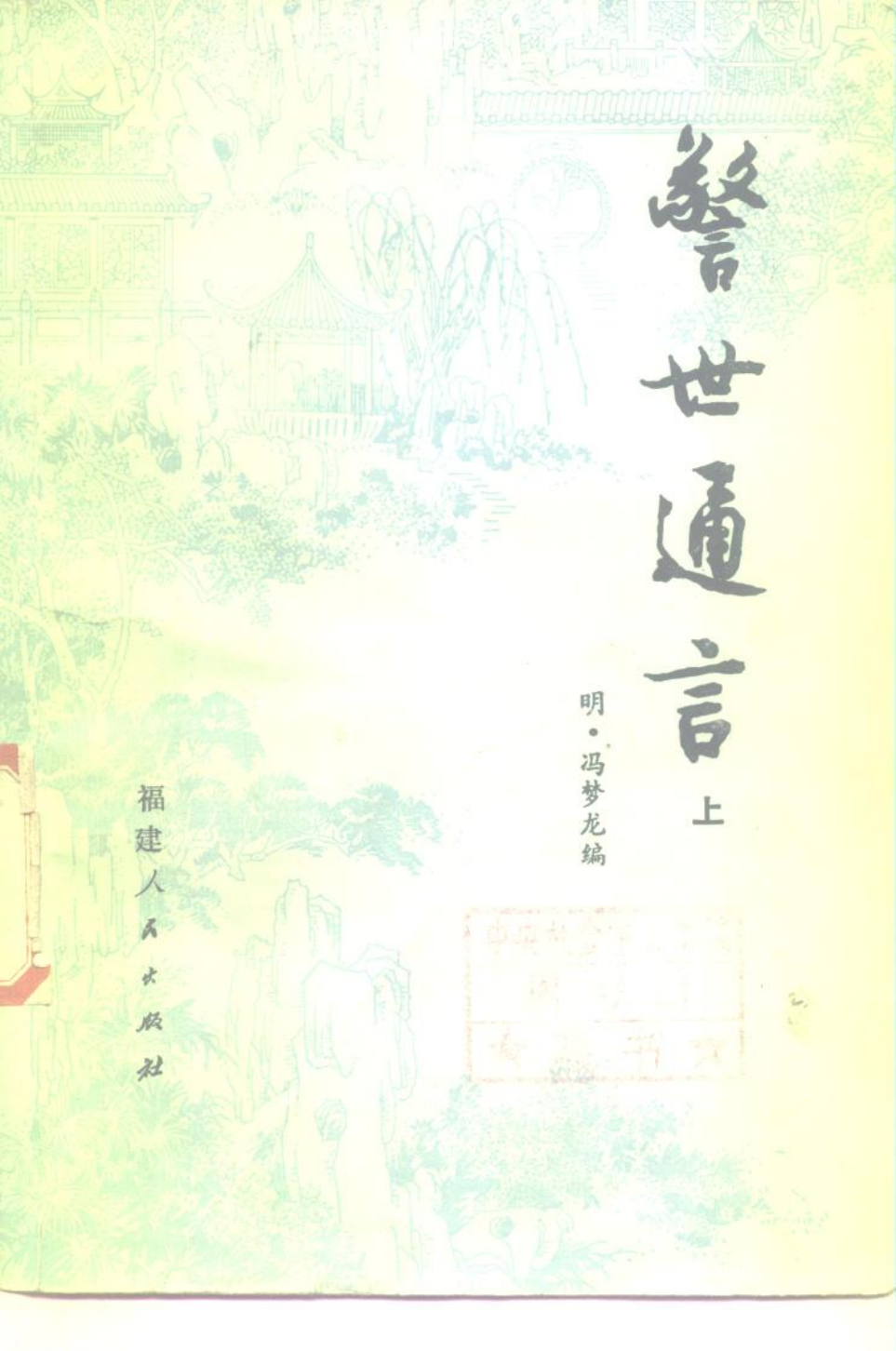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上

明·冯梦龙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I242.3

明·冯梦龙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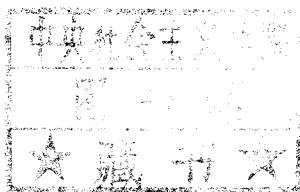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上



200193352

福建人民出版社



I242.3

明·冯梦龙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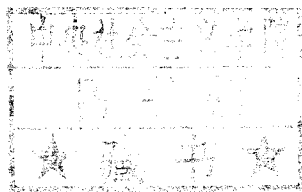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200193370

下

福建人民出版社



警世通言

冯梦龙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25印张 4插页 431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73·263 定价: 上下册1.75元

前 言

《警世通言》是明末冯梦龙所编纂的“三言”的第二集，刊于明熹宗天启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现存的足本共四十篇，系明代兼善堂刊本，发现于日本。

《警世通言》中的四十篇小说，与《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初刻本）一样，是宋至明代长时期的社会产物。这部选集不但具体地反映了宋、元、明之间话本小说不断发展的情况，同时也显示了我国古代民间文学家在小说创作方面杰出的艺术才能。

话本是流行于市民之中的说话艺术的底本。正由于此，它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就必须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和理解。鲁迅先生认为：这些小说“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这说明话本小说的作者们虽然也从历史上和说部中选取材料，但更多地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觅取题材进行创作。纵观全集，唐代以前的故事只有少数几篇，而宋、元、明的故事则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知道，任何优秀的作品都是时代的镜子，《警世通言》的作者们就创造了不少当代人物的真实形象，描绘出当时的社会风貌，从而展现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描写青年男女婚姻和爱情的作品，在本书中占最大的比重，体现了鲜明的反封建思想，表现了妇女们追求爱情，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在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备受压迫，妇女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最深重，反抗也就最强烈。这种强烈的反抗

性，集中地表现在她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婚姻爱情的追求上。《警世通言》的作者们突出地塑造了许多不同阶级出身，却一样具有反抗性的妇女，特别是市民妇女形象，表现了她们在追求爱情上的大胆、泼辣和执着。如《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璩秀秀，是一个裱裙匠的女儿。她被咸安郡王强索入府当养娘。某晚王府失火，在一片混乱中遇见她心目中的情人崔宁，便主动向他提出“我和你先做夫妻”，大胆地否定了封建的意识观念。直至最后被抓回来活活打死，她仍然执着于真挚的爱情，成了鬼也要和崔宁做夫妻。《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的爱爱，也是这样一个女性。她与吴清一见钟情，生前未能结合，死后还来团聚。至于那些出身封建统治阶级的妇女，受封建教育多，思想负担重，因而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就不仅要冲破外界的封建势力，还要摆脱自己头脑中的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她们所走的道路也就更加曲折而且历尽艰辛。《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生自侯门将相家”。对于司教之子周廷章的狂热追求，她始而拒绝，继而联诗唱和，感情蕴蓄，态度矜持；只有当她作出重大抉择时，才表现得相当坚决和果断。她对天设誓，请曹姨为媒，深沉执着地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可是周廷章竟然负心弃义，这使王娇鸾极其愤慨，自杀之前，她通过巧妙的安排，使周廷章死于乱棒之下，达到了报复目的。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书中刻划了一批聪明、美丽、多情多义和具有高尚情操的都市妓女形象，倾注了作者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也表达了鲜明的褒扬。《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苏三，在王景隆沦落为乞丐时，仍然一往情深，资助盘缠，并誓死不再接客。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作者更是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杜十娘身为名妓，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八年的卖笑生涯，使她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清

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卑贱地位。她强烈地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决心择人而适，跳出火坑。为此，她很早就准备“从良”，秘密地“蕴藏百宝”。当她遇到李甲之后，经过再三考验，认为李甲“忠厚志诚”，就决心委以终身，凭着自己的机智，与鸨儿展开斗争，终于摆脱羁绊，同李甲成婚。可是不久，李甲就由于惧怕父亲李布政，在富商孙富的教唆下，出卖了杜十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杜十娘始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她既不肯吐露箱中藏有巨宝，以财物换回李甲虚伪的爱情；更不肯把自己降为商品，委身孙富。终于怀抱“百宝箱”，决然投江，以死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这篇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写出了造成杜十娘悲剧的根源，不只在于李甲的薄幸和孙富的阴险，而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因为作为妓女的杜十娘的被买被卖，以及作为封建势力代表者的李布政的存在，都是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承认和允许的。作者正是借杜十娘这一光辉动人的悲剧形象，抨击了残酷的封建制度，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意义。

《警世通言》中有不少作品揭露了黑暗的封建政治，具有较强烈的批判精神。作者笔锋所向，触及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各个阶层。《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咸安郡王，就属于上层统治集团。尽管作者对他的揭露还不够深刻，但也描绘出了他的狰狞面目：他“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下令将秀秀拖至后花园，活活打死。《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写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金满丢失库银，竟私设公堂，滥施刑讯，将无辜的小厮秀童折磨几死，从侧面暴露了官府的黑暗。《范鳬儿双镜重圆》中，前面的入话是一个小故事，写的是北宋末年金兵入侵，百姓逃难的境况：“……只听得背后喊声振天，只道鞑虏追来，却原来是南朝杀败的溃兵。只因武备久弛，军无纪律，教他杀贼，一个个胆寒

心骇，不战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抢掠财帛子女，一般会扬威耀武”。转入正文后，写福建闹天灾，“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可是，“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民反”乃是“官逼”的结果。《李滴仙醉草吓蛮书》，再现了伟大诗人李白才气横溢、超脱飘逸的“滴仙人”形象。赞美了李白蔑视权贵、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对权奸杨国忠等人给予无情的嘲讽和鞭鞑，表达了人民鲜明的爱憎。另外有些作品，往往在不经意之中揭穿封建制度虚伪和不合理的真相。如《老门生三世报恩》，主旨系褒扬鲜于同的报恩行为，是不足取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黜顺之立意不让鲜于同考取，屡次毫无理由地变换阅卷或改变取士标准的具体描写中，看出了无数“士子”为之醉心的科举制度的腐朽本质，其中所寄寓的讽刺是辛辣的。属于批判封建政治而情况又比较复杂的篇章，是《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这篇作品当创作于南宋以后，所反映的是北宋时实行“新法”的情况。北宋时对内的“不抑兼并”政策，越来越加深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对外的妥协政策，则使西夏和辽成为心腹之患。而王安石推行“新法”，其目的就在于革除积弊，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这种改革属于改良性质，并不彻底；加之在用人方面也存在问题，因之实行时也确实存在“扰民”情况。到了北宋末年，蔡京等“六贼”当政，打的是王安石“新法”的招牌，干的是祸国殃民的勾当，终于导致了北宋的覆亡。南宋时，人民怀念沦陷的中原，对蔡京等人的误国行径恨之入骨，而大多数人对蔡京与王安石区别不清，从而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多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拗相公饮恨半

山堂》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尽管它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是片面乃至错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了北宋末年蔡京奸党当权误国，广大农村田园荒芜，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说，作品所包含的批判封建政治的意义仍是很鲜明的。

除了上述两类作品外，《警世通言》中还有一些篇章，歌颂了人民的真诚和正义，鞭挞了背恩弃义的恶人。例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篇，叙述了俞伯牙突破贵贱等级界限，与樵夫钟子期结为生死之交的故事，歌颂了朋友之间生死不渝、肝胆相照的情谊；《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则歌颂了赵匡胤不贪女色、仗义救人的优秀品德。而在《桂员外途穷忏悔》中，桂富五夫妇被施济从破产自杀的道路上救起来，但他发财以后，却忘恩负义。作者通过虚构的情节让他们全家都变成狗，以示惩罚。这对现实生活中那些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人，也是强烈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

《警世通言》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中一些比较优秀的篇章，继承了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有新的突破，运用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具体说，它以下的艺术特色：

一、通过人物的对话、动作、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的描绘，刻划人物性格，“不务装点，而情态反如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例如在《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秀秀与崔宁的一段对话，就饶有趣味：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

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

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忘了？”

崔宁又则应得“喏。”

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

崔宁道：“岂敢。”

秀秀的泼辣、大胆，崔宁的老实、软弱，通过这一番对话而跃然纸上。真实、具体的细节描写，也是作者们用来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法之一。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在酒楼与孙富商量好了回到船上，装出“怀抱郁郁”的样子，此时，杜十娘“抱持公子于怀间，软言抚慰”。但当李甲讲出了他和孙富的肮脏交易时，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这八个字构成的细节，极其细致入微，绘声绘影地表现了杜十娘突然遭受重大打击后的巨大悲痛和强烈的愤怒，然而这种悲痛与愤怒在性格沉静、经历丰富的杜十娘身上，又只能表现为“冷笑一声”。这个细节所蕴蓄的情绪，比放声大哭显得更加沉痛；其间所包含的谴责和轻蔑，也比一场痛骂更为强烈。

在情节结构上，一方面是单线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沿着一条线索向前发展，有头有尾，脉络分明；另一方面，又通过伏线的埋设、偶然性情节的安排以及场景的映照衬托等来组织矛盾冲突，形成既单纯流畅，又曲折生动的艺术特色。试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例。杜十娘与李甲之间的爱情纠葛，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中心事件，而最后杜十娘出人意外地拿出了“百宝箱”，并“投之于大江中”，正是惊心动魄的情节高潮。至此，读者才恍然大悟。其实，“百宝箱”这一线索，早在情节开端即已埋设。而整个情节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偶然性事

件。杜十娘在瓜洲渡口碰上孙富当然是偶然的。试想：如果不是李甲当夜要听十娘的“妙音”，或者十娘不肯“开喉顿嗓”，就不会引出孙富来了。这种偶然性事件又是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的。因为即使杜十娘不死于江中，也必将死在今后被遗弃的时候。至于李甲在酒楼上与孙富商定出卖十娘的场面，十娘在船中摆设酒果，挑灯以待的情景，一经作者有意识地置于一一起，映照对比，就产生了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进一步渲染了悲剧气氛。

三、作品的语言，深受宋元话本的影响，基本上保持口语化的优点，具有通俗、生动、丰富多采的特点。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苏三在大街上骂鸨儿王八的话，完全是市民口气，富有生活气息。

应当指出，《警世通言》中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艺术水平也参差不齐，这同各篇非出自一人之手固然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由于这些作品产生于封建社会，即使是最优秀的作品，也只是根据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观点写成的，也只能反映出某些新思想的萌芽而已，却不可能离开封建制度的土壤去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有的作品往往很勉强地写上几笔“欢”和“合”，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成为阶下囚的苏三，和当上八府巡按的王景隆的大团圆，虽说符合人民愿望，但不免掩饰、调和了阶级矛盾，无法更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本质。有的作品没有把严正的批判进行到底，不是中途停顿，就是绕开矛盾。如《陈可常端阳仙化》，善良的和尚陈可常并没有与吴七郡王的婢女新荷通奸，却被人诬陷，遭到郡王毒打而死。这本是个严肃的主题，但受害者陈可常毫无怨言，还说什么“只因我前生欠宿债，今世转来还”，抹煞了原有的尖锐矛盾，宣扬了宿命论。还有些公案小说，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况太

守断死孩儿》等等，出现了包拯、况钟等清官形象，这本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可是，写断案靠冤魂现身、死婴啼哭，这就削弱了清官的典型意义，宣扬了迷信思想。在少数作品中，封建迷信、落后反动的东西甚至成为主要内容，几乎通篇都是糟粕。有的宣传荒诞迷信，因果轮回思想，如《计押番金鳊产祸》、《崔衙内白鹇招妖》；有的是宣扬夫权主义，反对妇女改嫁，提倡片面的贞操观念，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有的故事是对妇女的歪曲、诬蔑，并夹杂着淫秽的色情描写，如《蒋淑贞刎颈鸳鸯会》等。在《范鳬儿双镜重圆》等篇中，把起义者称为“反贼”，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应予批判。在艺术上，有些人物形象不够完美，有概念化的倾向；有些韵语与本文游离；语言上还有不少陈词滥调。所有这些，都大大损害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也是我们在阅读作品时所应当严肃批判和细心剔除的。

张 文 潜

一九八一年元月

校勘说明

本书的校勘，是以《世界文库》根据明兼善堂本传钞排印的《警世通言》为底本，参对了《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今古奇观》等几种不同版本，以校正底本的误字。同时，也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警世通言》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古代白话小说选》等书。

在校勘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改正底本上明显的错用和颠倒之字。如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第三二四页第五行，改“元朝大顺年间”为“元朝天顺年间”。因元朝只有“天顺”年号，故改“大”为“天”。又如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第五一三页倒数第二行，原为“鸳鸯刎颈会”，据本卷标题和《清平山堂话本》改为“刎颈鸳鸯会”。

（二）根据前后文，统一不同之字。如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第四五八页倒数第四行，原“拜认周夫人为姑”，据前文“王夫人与我同姓”，而把“周夫人”改为“王夫人”；第四十卷《旌阳宫铁树镇妖》第五四六页第六行，原“急将手中实剑”，据前后文，改“实剑”为“宝剑”。

（三）在底本与他本之间，选用较宜之字和填补缺漏之字。如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第三八九页倒数第八行，原“西湖水干，江湖不起”，《古代白话小说选》作“西湖水干，江湖不起”。两者之间，选后者，改“湖”为“潮”。又如第三十

三卷《乔彦杰一妾破家》第四三九页倒数第三行，原“割户分门坏五□”《清平山堂话本》作“割户分门坏五伦”，此字与全诗所用之韵同属一部，且文义亦可通，故填上“伦”字。

（四）按文义、惯例和己意，改动疑误之字。如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第一二九页第十九行，原“讨其一筊，‘若该往南京，乞赐圣筊。’掷下果然是个圣筊”。从文义上看，应以“筊”为是，故改“筊”为“筊”。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第三九五页第十三行，原“鸾凰未偶”，按习惯应是“鸾凤未偶”，“鸾凤”并用，比喻夫妻，此处作“鸾凰”似不妥。

另，本书第三十七卷《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由于底本不载，又暂无他本可校，全卷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本补入。

以上所举之例，并非本书校勘全貌。总的说来，我们力求保持原作风貌，对可改可不改，或明知有误，但涉及面太大的不改；有些故事中引用的诗词，有的诗句不同于原作，有的所署作者姓名也有出入，但此类情况甚多，改不胜改，还是保持原貌为是；对方言、俗字、古今通用字，亦不作改动；对虽有疑问，但无充分改动理由的，以及底本表示删节、脱漏之方框（□），均暂从阙如。本书注明删节之处，系原《世界文库》本所删。

本书校勘工作承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由廖天敏、郭天沅同志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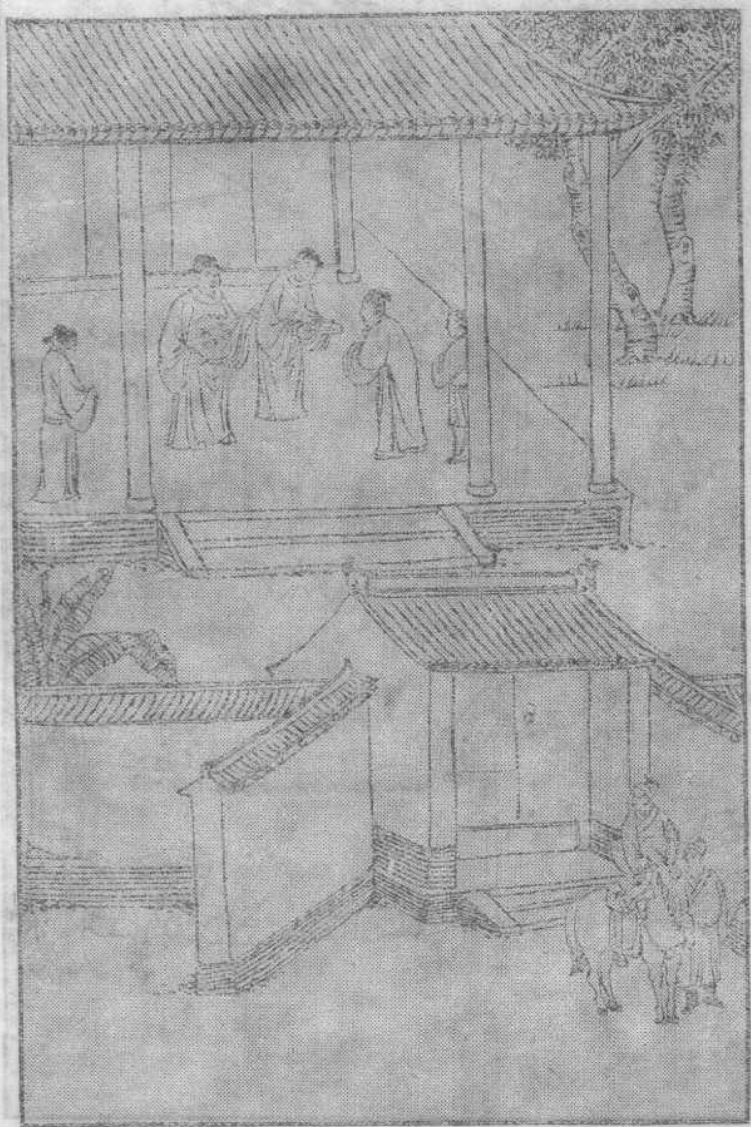
因限于水平，加之时间仓促，可能有许多不当之处，尚待读者匡正。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叙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赧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赧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宾筵，乌用是齐东嫫嫫者为？呜呼！《大人》、《子虚》，曲终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匱石室之遗，而赧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赧，即事赧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赧而孰真也！陇西君海内奇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

所济者众。遂名《警世通言》，而从臬其成。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